

# 民族多元共生的基本逻辑: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袁年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强调民族多元共生的基本逻辑,旨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分离主义的认知缺陷,为正确理解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提供一种合理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阈。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各民族休戚相关的共生系统,具有深刻的物质动因。当民族共生结构在时空向度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稳定下来之后,可以深化为人们能够操作的一套符号系统。各民族因共生而相互具有主体性,一体化条件下的对称性互惠共生是民族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的基本路径。相关结论也揭示了民族共生的过程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共生形态,而且也能够形成新的物质结构,有利于促进民族关系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不断演变。

**关键词:** 民族; 多元共生; 民族关系; 共生逻辑; 共生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2)03-0058-08

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而言,从总体性的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对此,乔健先生曾经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出了相关看法“中国这么多民族聚在一起,共同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对于这个格局只有人类学者可以提供全面的、客观的、系统的解释。这种解释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解释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其又有共性又有个性化的特点;第二,解释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经贸、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第三,分析形成这种共存共荣的大团结格局的基本原因,并作出结论。”<sup>[1]</sup>然而,诚如周星教授所言,目前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尤其是少数民族研究,基本研究范式主要还是停留在“族别”研究的层面,而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和各民族的“多样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问题缺乏深入探讨<sup>[2]</sup>。作为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互动关系研究,不仅需要田野工作的微观考察以及经验总结的宏观关照,而且还需要研究过程的逻辑性、可验性和科学性。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了“民族共生关系”分析框架,把共生逻辑作为分析着眼点来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和“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明确民族多元共生的充分条件之后,本文通过HS这个民族杂居社区的个案,分析概括民

族共生的基本逻辑命题,并通过共生模型的量化分析,验证相关命题的客观性。

## 一、民族多元共生的基本要素 “民族共生关系”理论分析框架

在共生系统理论中,任何一种共生关系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共生单元(u)、共生模式(m)及共生环境(E)<sup>[3]</sup>。如图1所示,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的单位,它是形成共生系统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结合的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反映作用的强度。共生环境指除共生单元以外的一切影响因素的总和,Ep、En、Em分别代表正向环境、反向环境和中性环境。图中箭头指向表示物质、信息或能量的流向,受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界面三要素制约。在共生关系的三要素中,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外部条件。

作为一种方法论,共生理论为我们审视民族关系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民族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共生关系,多元共生为每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在我国,“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

收稿日期: 2012-03-20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10490217)。

作者简介: 袁年兴(1975-),男,湖北省阳新县人,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民族学博士,主要研究民族学人类学。E-mail: dearxdm@163.com

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sup>[4]</sup>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共生

系统,因此,可以根据共生系统的基本原理,提出“民族共生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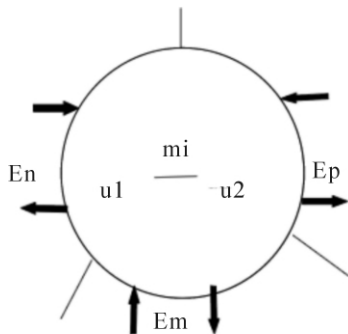


图1 共生系统三元素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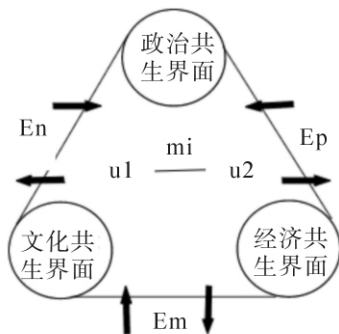


图2 民族共生关系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民族共生关系”分析框架属于一种预设的研究范式,突出影响民族关系走向的多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微观基础,强调宏观逻辑与微观群体行为之间的联系。对此,可以确定相关研究的几个重要着眼点:

笔者将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来扩展这一分析框架。研究工作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民族共生过程的多重逻辑及其微观意义的理论讨论。二是对民族共生的内生性过程的实证分析。

### 二、理论探讨: HB 社区民族共生的逻辑命题

第一,多元共生与民族主体性的辩证关系。民族的凝聚力和主体性是民族多元共生关系的前提条件,民族共生的目标诉求在于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及共同繁荣。笔者将此概括为民族多元共生的第一个充分条件,即民族多元共生关系的形成,对民族文化的异质性要求更高。只有在民族共生的过程中才能认识到民族主体的基本属性。

下面笔者集中讨论 HB 社区民族共生过程中的逻辑命题。HB 社区位于藏彝走廊西南端,自古以来是诸多民族迁徙繁衍、共生融合的交汇之地,能够深刻地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本质特征。根据社区委员会 2009 年 8 月的统计数据,HB 社区现有总人口 3722 人,其中纳西族 1711 人,汉族 730 人,彝族 373 人,回族 536 人,傈僳族 319 人,其他少数民族 53 人,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社区。

#### (一) 经济层面的共生逻辑。

第二,民族共生行为对民族发展的作用。民族发展是指,“纵向质的提高和横向量的扩展,不断实现自身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的过程”<sup>[5]</sup>,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的提高。笔者将此概括为民族多元共生的第二个充分条件,即民族共生发展不同于民族的单自发展,能够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协同能量和动力。对这一特定领域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和预测民族发展的不足。

HB 社区最早为纳西族聚居村落。民国《中甸县志》记载“中甸原名‘建塘’,居于金沙江怀抱,与西康之里塘巴塘接壤。元以前本为吐番游牧之地,明季丽江木氏移民渡江屯殖;当时木氏之分布,北通巴塘,西北越阿墩子,西达藏边,伏居、江曲、建塘地面,皆曾归木氏。迄明末清初,藏番以势驱逐木氏,始渐南徙建塘,内附于清。”<sup>[6]</sup> HB 社区位于原中甸县东南边,与丽江地区隔江相望,属木氏土司移民屯戍之重地。结合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格局,可以推断得出,HB 社区作为一个纳西族聚居区,形成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 年)之间。

第三,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对民族关系的作用。民族共生界面是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在政治共享、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中的媒介和载体;民族共生环境指除共生单元以外的一切影响因素的总和,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正向、反向及中性三种类型。笔者将此概括为民族共生的第三个充分条件,即民族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相关结果背后的驱动机制是可以分析和解释的。

康熙十三年后,中甸属蒙古和硕部统治。为了转移沉重的劳役和徭役,当地庄户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吸引外来移民开荒耕种。自纳西族之后,较早迁移到 HB 社区落籍的是汉族人,当地人称其为“四外人”。傈僳族迁移到 HB 社区的时间与“四外人”大体同步,“清代、民国由永胜、丽江一带迁入的

基于对民族对多元共生充分条件的初步了解,

傈僳族自称白傈傈或永胜傈傈,分布于虎跳峡镇东坡村阳山一二三社、阴山上下社、里仁村路鲁习一二三四社、金江乡士达二台坡、三坝哈巴、洛吉岩洛等地。”<sup>[7]</sup>20世纪初,HB社区又有回族和彝族陆续迁入。“四外人”带来了内地的耕作技术,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也改变了彝族和傈僳族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根据农作物的生产条件,HB社区的地理环境大体可以分为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从海拔2900米至3200米,除花椒、苞谷及土豆以外,其他农作物的产出非常有限,该阶梯主要生活着回族和彝族,传统的经济活动完全依赖HB雪山的森林资源,以放养牛羊和采集药材为主。第二级阶梯从海拔2400米左右到海拔2900米,适合种植荞麦、小麦、土豆、青椒、核桃、蚕豆等农作物,主要居住着纳西族和汉族,粮食作物基本能够自给自足,饲养少量牲口。第三级阶梯处于海拔1800米至2400米之间,紧靠金沙江,耕地非常有限,主要居住着傈僳族。在这种无法自给自足的生存背景中,各族需要依靠每月初一和十五定期举行的集市来获得各自的生活所需。集市地点定在社区村中心地带,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也就是说,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环境使HB社区成为了一个息息相关的共生系统。

除开自给自足或用于物物交换的粮食作物外,现阶段HB社区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方面:雪山导游和花椒生产。HB雪山登山旅游的服务项目包括住宿、马匹和向导。随着客人的增多,客栈和导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YS利用雪山牧场的使用权,在大本营(雪山中转站)开了一家旅馆,有意提高其他导游带来的游客的价格,让大家心存怨气。花椒生产是HB社区主要的收入来源,2008年全村总产量达到一百五十余吨。原先产量不高时,都是委托公路两旁的小商铺代理收购。后来,有人组织大家去外地联系买家,减少了不少的中间费用。不少代理商对此愤愤不平:“中间差价也就是1元钱(每公斤),他们来往联系还不是要花费的嘛,你说YY族人缺德不缺德?”同样,路边商人在买卖过程中“缺斤少两”的现象也被人封上“XX族人狡猾”的标签。然而,大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现实使彼此无可奈何,民族之间的污蔑性话语能够满足各自心理的不平衡。

对于HB社区这样一个多民族共生的社区而言,相对成熟的群体互动机制能够自动调适可能出现各种失衡状态。其中,族群相帮习俗就是众多

调适机制中的一项。之所以把相帮习俗称之为“机制”,是因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在长期的交往中,各族之间但凡一家有红白喜事或一族有节日庆典,几乎全体村民都会参与。参与的角色不仅仅是欢乐共享或有事共担,关键是各族主要成员在具体事务中都有重要的角色安排——这无疑是一次全民聚会。全民性的主人翁意识使平时的污名化话语在这种场合中得到了纠正和制止,笑他人者往往被众人所笑,尽管这对当事人而言无关紧要,但是这种历史的积淀深刻地体现了一种集体潜意识里的主体自觉。

通过对HB社区经济层面的考察,笔者提出民族多元共生的第一个逻辑命题,它又分为三个方面:1.1民族和谐共生具有深刻的物质动因。1.2经济市场的竞争通过个体贯穿于民族关系的全部过程,能够影响民族关系的走向。1.3当民族共生关系在时空向度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稳定下来之后,能够形成自我调试的行为机制。

## (二)文化层面的共生逻辑。

HB社区目前使用的语言主要有纳西语、彝语、藏语、傈僳语及汉语西南方言,基本上都属于基于本族语言基础上的混合语或语言融合体,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或成分相互扩散或渗透。在语言借词方面,HB社区纳西族的语言除原有的词汇材料构词外,还从汉语和藏语中吸取了很多借词,如藏语借词有:ndzur<sup>31</sup>牦牛、le<sup>33</sup>麝、la<sup>33</sup>ma<sup>31</sup>喇嘛等,汉语早期借词有:tv<sup>33</sup>桶、lo<sup>31</sup>ko<sup>33</sup>烙锅、ha<sup>33</sup>ta<sup>13</sup>汗衫、to<sup>33</sup>pu<sup>55</sup>布匹等,现代汉语借词有:ta<sup>55</sup>ya<sup>31</sup>党员、ji<sup>31</sup>cu<sup>31</sup>英雄、ku<sup>33</sup>ze<sup>31</sup>工人等。HB社区回族操用的藏语还保留有汉语陕西方言的个别词汇,如“俺们”、“锅盔”、“占牛”等,又掺杂有阿拉伯、波斯语词汇,如“伍斯托”、“海里凡”、“换水”、“山眠”等。HB社区彝语的早期汉语借词有:pu<sup>33</sup>ku<sup>33</sup>苞谷、ku<sup>21</sup>jo<sup>33</sup>裹脚、du<sup>33</sup>燕麦,现代汉语借词则更多,如ko<sup>33</sup>zw<sup>21</sup>工人、zw<sup>21</sup>mi<sup>21</sup>人民、ka<sup>21</sup>pu<sup>21</sup>干部等。HB社区的傈僳族语中的纳西语和汉语借词有全借、译音加注等形式,而汉语方言为川音,但又有其特殊的地域语音,“子”、“啪”、“呗”等尾词较多。在句法系统的生态结构层面,各族语言具有明显的汉藏语系的特点,主谓语和宾语常常颠倒,如“你什么做在”(你在做什么)、“我花椒地里摘克”(我去地里摘花椒)。大体而言,HB社区从表层到深层形成的各种民族语方言,没有改变原有语言的基本特征,而是使被渗透的语言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HB 社区不同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有纳西族的东巴教、回族的伊斯兰教、傈僳族和彝族信仰的原始宗教。这些独特的文化特质在当下各族的丧葬仪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以丧葬仪式中的禁忌为例,纳西族禁忌披麻戴孝的人进别人的门,发表出灵时属相与死者相同者须回避,土葬所用棺槨要用整块木板做成;彝族火葬遗体时忌讳将牛、羊骨抛入火中,遇遗体难以焚烧时,孝子要跪在尸架前祈祷;傈僳族在丧葬仪式中讲究安葬和停尸期限,忌“焦莫”、“焦忍”,忌讳空手转告噩耗,忌食辣椒;回族在丧葬期间需要阿訇敬诵《古兰经》,禁忌披麻戴孝、哭丧以及所有娱乐活动。除禁忌有所不同之外,各族丧葬仪式中的程序都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回族的“阿訇”、纳西族的“东巴”、彝族的“毕摩”及傈僳族的“尼扒”不可跨越民族的边界,只能在本族内主持仪式。

在居住文化中,原先彝族、傈僳族使用的木棚房或石木房以及汉族和纳西的土胚房,现在多半与藏区藏族建筑“崩空”相似。房屋建筑凸显的实用性功能比较强,是对高原峡谷气候环境的一种适应,而且具有很好的防震功能。在饮食文化方面,各族一方面保持着本族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下不断调适自己的饮食结构和习惯,表现出与自然环境和市场环境相适应的特性。以酥油茶为例,作为 HB 社区男女老幼日常饮用、待客中必不可少的饮料,对于缺少蔬菜和水果、以肉食为主的村民来说,具有去腻顺肠之功效。在服饰方面,日常生活中除了回族老年妇女和彝族女性保留有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外,各族的劳动服饰并无大异。但在节假日或婚嫁娶等喜庆日子,男女老少都喜欢穿上本族的传统盛装欢歌载舞。这样的欢庆具有共享性,如彝族的火把节、纳西族的祭龙日及汉族的一些传统节日。总体来讲,在民族互动的活动中,各民族并非盲目地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民族文化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总是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

通过对 HB 社区文化层面的考察,笔者提出民族多元共生的第二个逻辑命题,它也分为三个方面: 2.1 民族共生的意义在于相互承认、尊重各自领域的主体性。2.2 民族文化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总是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主体的文化价值及族际共生共享的双重诉求贯穿于共生运动的全部过程。2.3 文化的共享域是民族关系超越二元对立的中间地带,是民族共生发展的必然要求。

### (三) 政治层面的共生逻辑。

与民族关系有关的政治层面的共生逻辑,可以从宏观的政策及相应的微观行为中得到体现。HB 社区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及土地制度紧密相关。木氏土司征战康区的过程中,为了巩固军事成果,每夺取一要地,便“屠其民,徙糜些戍之”<sup>[8]</sup>,这些移民战时出兵役、劳役,闲时开荒耕种,使金沙江一带产生了大量可耕种的田地。到了和硕特部统治时期,属卡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属卡制度“认甲不认户”,即属卡内的民户在差役、赋税上不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而都是通过属卡。然而自康熙十三年(1674 年)以后,属卡内很多人户通过各种关系取得了免除劳役、赋税的特权,以致出差役负担的户逐年减少<sup>[9]</sup>。由于总役税数额并没有相应减少,庄户属卡制度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无论是占绝大多数的属卡还是有限的庄户都非常欢迎外来移民开荒耕种。

HB 社区现行的村民委员会制度是村民参与行政管理和享受政治权利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各族人民政治成果共享的一个主要共生界面。相比历史上的民族政治共生界面,HB 社区现行的“一事一议”制度无疑具有优良共生界面的特征,它促使民族共生单元、民族共生环境以及民族共生模式之间能够有效运行。HB 社区的“一事一议”制度,遵循“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上限控制、使用公开”的原则,在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同时,该村还结合实际,加快推进了新农村建设以及民族之间的互惠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

政治层面的因素还对 HB 社区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HB 社区隶属于西藏自治区,藏族身份具有比较大的民族优惠政策。选择藏族身份,关键是能够给子女带来很多好处,或高考加分,或在事业单位有更好的发展。如果配偶一方是藏族,子女的民族身份一般都会选择藏族,因此,有人专门找藏区姑娘做媳妇。在 HB 社区,2000 年新进藏族成员的家庭共计有 17 户,其中子女选择藏族的有 15 户。不仅如此,相关政策使部分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紊乱,其中“藏回”就是典型的案例。“藏回”是一种“他称”,是被他人称为“藏回”而自己也承认是这一称谓的部分民众。“藏回”的称呼能够满足他们对现状的维持,因为这种称谓既能够表明他们的回族身份,又能证明他们为子女选择藏族的合理性。

政治层面的因素对 HB 社区的宗教信仰在历史

上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957年,中甸地区实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后,各种宗教被视为封建迷信,宗教活动受到强行制止。特别是在随后的“十年动乱”中,绝大部分的宗教书籍被焚烧,宗教专职人员被划为“四类分子”接受改造,属于“人民专政”的对象。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哈巴村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是在十多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复位”。特别是对于当地回族而言,在2003年恢复伊斯兰教信仰前,村民中有人生病,吃药不行就去请巫师来跳神,杀鸡宰羊是免不了的,有时也请东巴师或者是喇嘛来念经,去山里烧香。

通过对HB社区政治层面的考察,笔者提出民族和谐共生的第三个逻辑命题,也分为三个方面:3.1作为共生界面的政策制度必须具有绝对的平等性,这是民族共生发展的必要条件。3.2政治共生界面在民族共生秩序、文化交流及经济合作等方面具有导向功能。3.3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民族共生界面通常具有内生性,不同的共生界面可以导致不同的共生模式和共生效果。

三、命题检验:HB社区民族共生逻辑的元分析

在方法论上,个案研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随着

现代社会日趋复杂,把个案作为提炼概括性结论的工具越来越无法体现现象本质<sup>[10]</sup>,这需要我们能够把人类学的个案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的系统量化研究方法有效结合起来,对相关分析性的概括作必要的检验。在这里,笔者建立了共生分析模型,尝试着对民族多元共生的逻辑命题进行检验<sup>①</sup>。

(一) 民族共生评价模型的构建

1. 民族共生模式评价。假设存在共生民族A和B,它们在经济、文化及政治层面的共生参数分别有 $Z_i$ 和 $Z_j$ ,我们定义A和B的共生关联程度 $\delta_{ij}$ 为:

$$\delta_{ij} = \frac{dZ_i/Z_i}{dZ_j/Z_j} = \frac{Z_j}{Z_i} \frac{dZ_i}{dZ_j} (dZ_j \neq 0)$$

$\delta_{ij}$ 表示共生民族A和B的共生度,其含义是民族A的变化率所引起的民族B的变化率。如果 $Z_i$ 和 $Z_j$ 分别是A和B的主体属性,则 $\delta_{ij} = \delta_{ij}^m$ 称为A和B的特征共生度,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达A和B的共生特征的变量:

$$\delta_{ij}^m = \frac{Z_{mi}}{Z_{mj}} \frac{dZ_{mi}}{dZ_{mj}}$$

结合“民族共生系统”分析框架,A和B共生模式具有如下表现:

表1 民族共生模式表

	A	> 0	= 0	< 0
B	> 0	互惠共生	正向偏利共生	寄生
	= 0	正向偏利共生	共生	反向偏利共生
	< 0	寄生	反向偏利共生	反向共生

很显然,如果 $\delta_{ij}^m = \delta_{ji}^m > 0$ 则A和B处于正向对称共生状态;若 $\delta_{ij}^m \neq \delta_{ji}^m > 0$ ,则A和B处于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如果 $\delta_{ij}^m = \delta_{ji}^m < 0$ 则A和B处于反向对称共生状态;若 $\delta_{ij}^m \neq \delta_{ji}^m < 0$ ,则A和B处于反向非对称共生状态。

2. 共生系数评价。设定共生民族A和B的共生系数为 $\theta^m$ ,可得:

$$(1) \theta_i^m = \frac{|\delta_{ij}^m|}{|\delta_{ij}^m| + |\delta_{ji}^m|}$$

$$(2) \theta_j^m = \frac{|\delta_{ji}^m|}{|\delta_{ij}^m| + |\delta_{ji}^m|}$$

显然, $\theta_i^m + \theta_j^m = 1$ 。在正向共生或反向共生情况下,只要是对称关系,则共生系数 $\theta_i^m = \theta_j^m = \frac{1}{2}$ 。据此,可以作如下判断:

- (1) 若 $\theta_i^m = 0$ ,表明A对B无任何影响。
- (2) 若 $\theta_i^m = 1$ ,表明B对A无任何影响,A对B有影响。
- (3) 若 $0 < \theta_i^m < \frac{1}{2}$ ,表明B对A的影响大于A

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共生分析模型在分析两者互动关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在管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已有成熟的应用案例,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袁纯清的《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及《金融共生理论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姚娟的《基于共生理论的物流交易模式研究》、王海光的《企业集群共生治理的模式及演进研究》、陶永宏的《基于共生理论的船舶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与发展演变研究》等。在民族学方面,可以参见拙作《民族共生理论:散杂居民族关系及目标范式研究》、《民族共生发展的形成理路及运作机制》。

对 B 的影响。

(4) 若  $\theta_i^m = \frac{1}{2}$ , 表明两者相互影响作用相同。

(5) 若  $\frac{1}{2} < \theta_i^m < 1$ , 表明 A 对 B 的影响大于 B

对 A 的影响。

(二) HB 社区民族共生评价。

根据“民族共生模式”表, 可以指定相应的数值, 即把  $>0$  的区域取值为 1,  $<0$  的区域取值为 -1, 那么可得: 寄生(-1, 1), 反向偏利共生(-1,

0), 并生(0, 0), 正向偏利共生(0, 1), 互惠共生(1, 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民族政治共生主要表现在共生界面上, 通过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的层面得到体现, 故在此不经过分析模型检验。

1. 民族文化共生概况。第一步: 通过梳理第二节涉及到的民族文化内容(相关数值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与 HB 社区民族主体性不相关或相关不紧的不在其列), 结合评价模型, 分别得到下列 5 组数据, 分别见表 2 至表 6。

表 2 民族宗教共生模式数据分析表

民族(A,B)	纳西族 B	汉族 B	回族 B	彝族 B	傈僳族 B
纳西族 A	—	0,0	0,0	0,0	0,0
汉族 A	0,0	—	0,-1	0,0	0,0
回族 A	0,0	-1,0	—	0,0	0,0
彝族 A	0,0	0,0	0,0	—	0,0
傈僳族 A	0,0	0,0	0,0	0,0	—

表 3 民族语言共生模式数据分析表

民族(A,B)	纳西族 B	汉族 B	回族 B	彝族 B	傈僳族 B
纳西族 A	—	1,1	0,1	0,0	0,0
汉族 A	1,1	—	0,1	0,1	0,1
回族 A	1,0	1,0	—	0,0	0,0
彝族 A	0,0	1,0	0,0	—	0,0
傈僳族 A	0,0	1,0	0,0	0,0	—

表 4 民族服饰文化共生模式数据分析表

民族(A,B)	纳西族 B	汉族 B	回族 B	彝族 B	傈僳族 B
纳西族 A	—	-1,0	0,0	0,0	0,0
汉族 A	0,-1	—	0,-1	0,-1	0,-1
回族 A	0,0	-1,0	—	0,0	0,0
彝族 A	0,0	-1,0	0	—	0,0
傈僳族 A	0,0	-1,0	0	0,0	—

表 5 民族饮食文化共生模式数据分析表

民族(A,B)	纳西族 B	汉族 B	回族 B	彝族 B	傈僳族 B
纳西族 A	—	1,1	1,1	0,1	0,1
汉族 A	1,1	—	1,1	0,1	0,1
回族 A	1,1	1,1	—	0,1	0,1
彝族 A	1,0	1,0	1,0	—	0,0
傈僳族 A	1,0	1,0	1,0	0,0	—

表 6 民族居住文化共生模式数据分析表

民族(A,B)	纳西族 B	汉族 B	回族 B	彝族 B	傈僳族 B
纳西族 A	—	1,1	1,1	0,1	0,1
汉族 A	1,1	—	1,1	0,1	0,1
回族 A	1,1	1,1	—	0,1	0,1
彝族 A	1,0	1,0	1,0	—	0,0
傈僳族 A	1,0	1,0	1,0	0,0	—

第二步:运用共生系数公式,可以获得 HB 社区民族之间的共生系数,见下表 7。

表 7 HB 社区民族文化的共生系数  $\theta^m$

民族(i,j)	纳西族 j	汉族 j	回族 j	彝族 j	傈僳族 j
纳西 i	—	$\frac{2}{5}, \frac{3}{5}$	$\frac{2}{5}, \frac{3}{5}$	0,1	0,1
汉族 i	$\frac{3}{5}, \frac{2}{5}$	—	$\frac{2}{3}, \frac{1}{3}$	0,1	0,1
回族 i	$\frac{3}{5}, \frac{2}{5}$	$\frac{1}{3}, \frac{2}{3}$	—	0,1	0,1
彝族 i	1,0	1,0	1,0	—	0,0
傈僳族 i	1,0	1,0	1,0	0,0	—

上述表格说明各族在文化层面的共生影响为:

- (1) 汉族、纳西族和回族对彝族、傈僳族产生了共生影响,而后两者对前三者没有明显影响。
- (2) 汉族对纳西族和回族的影响大于纳西族和回族对汉族的影响。
- (3) 纳西族对回族的影响小于回族对纳西族的

影响。

2. 民族经济共生概况。第一步: HB 社区的经济共生内容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在销售和消费等领域,是一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互补关系),我们可以获得民族经济共生模式的数据,见下表 8。

表 8 HB 社区民族经济共生模式数据分析表

民族(A,B)	纳西族 B	汉族 B	回族 B	彝族 B	傈僳族 B
纳西族 A	—	1,1	1,1	0,1	0,1
汉族 A	1,1	—	1,1	0,1	0,1
回族 A	1,1	1,1	—	0,1	0,1
彝族 A	1,0	1,0	1,0	—	0,0
傈僳族 A	1,0	1,0	1,0	0,0	—

第二步:运用共生系数公式,可以获得民族之间的共生系数。见下表 9。

表 9 HB 社区民族经济的共生系数  $\theta^m$

民族(i,j)	纳西族	汉族 j	回族 j	彝族 j	傈僳族 j
纳西 i	—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0,1	0,1
汉族 i	$\frac{1}{2}, \frac{1}{2}$	—	$\frac{2}{3}, \frac{1}{3}$	0,1	0,1
回族 i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	0,1	0,1
彝族 i	1,0	1,0	1,0	—	0,0
傈僳族 i	1,0	1,0	1,0	0,0	—

上述表格说明各族在经济层面的共生影响为:

- (1) 汉族、纳西族和回族相互影响作用相同,属于对称性共生模式。
- (2) 汉族、纳西族和回族对彝族和傈僳族的影响,大于后两者对前三者的影响,这属于正向偏利共生模式。
- (3) 彝族和傈僳族之间没有任何影响,属于共生模式。

1. 在 HB 社区民族共生系统中,彝族和傈僳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力最小,处于偏利共生的状态。特别是文化层面,他们对外的共生系数为 0。这主要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以狩猎为生,居无定所,与外界的接触交往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 and 随机性。为了维护其族内血统的纯正性,彝族一直保持着族内等级婚姻制度;傈僳族与外界也一直保持着距离,主要活动在“老熊湾”背后一带。历史原因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状态使他们更加依赖一种平等的

(三) 分析与说明。

(命题 3.1)、有效的共生界面(命题 3.2)来实现民族发展。他们边缘化的状态(命题 3.3)同样也表明了主体价值诉求(命题 2.2)与族际共享的辩证关系(2.3),反映了在一个多民族共生的社区里,共生合作是民族发展的根本途径(命题 1.1)。

2. 汉族对回族的影响大于回族对汉族的影响,这说明他们在总体上也是处于偏利共生的状态。从相关数据的对比来看,这主要发生在宗教领域层面。很长一段时间内,HB 社区的回族放弃了伊斯兰教信仰,如上所述,相关原因与国家政策及生存环境有关。这说明,国家政策作为一种共生界面,对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命题 3)。后来 HB 社区回族在云南、甘肃、新疆等地穆斯林的帮助下,重新修建了清真寺,实现了信仰的回归,这才使这一趋势有所转变。其中的过程反映了民族共生界面的内生性(命题 3.3)以及物质因素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命题 1.3)。

3. 回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层面。HB 社区的平均海拔在 2700 米左右,人们日常体能消耗较大,这就需要有足够热量的牛羊肉及有助于消化的酥油茶。HB 回族拥有雪山牧场的使用权,丰富资源的合理利用使他们在民族共生系统中能够源源不断的贡献新能量——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家民族政策对穆斯林饮食习俗的照顾(命题 3.2),深刻反映了我国民族共生界面的内生性(命题 3.3)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本质特征(命题 2.1)。

4. 汉族与纳西族及纳西族与回族之间的共生模式都是  $\delta_{ij}^m \neq \delta_{ji}^m > 0$ ,即处于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纳西族、回族及汉族之间的共生状态说明,共生系统的优化需要一种竞争机制(命题 1.2)的介入,需要在促进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体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乔健. 中国人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5(1).
- [2] 周星. 中国民族学的文化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J]. 开放时代, 2005(12).
- [3]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7.
- [4]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 1989(4).
- [5] 金炳镐. 论民族发展规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2).
- [6] 段绶滋. (民国)中甸县志[M]. 段志武, 和泰华, 标点校注. 中甸: 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1.

同样,彼此之间的共享域也是保证他们和谐共生的主要因素(命题 1.3)。而且,通过市场竞争中增强民族发展水平,不仅需要多层面、多渠道的合作交流(命题 3.2),充分发挥民族共生的系统效应,而且要求共生民族根据自身特点,不断地提高族内共生程度和族际共生能力。

#### 四、讨论与总结

因篇幅所限,笔者的个案描述还不是十分细微,也未能完全展现民族多元共生的丰富内容。笔者研究的优势在于构建了一种经验的、定性的探讨与逻辑的、量化的检验相结合的分析框架,较好地处理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全球化的机遇和风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挑战,这需要我们立足于一个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具有后发经验并处于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探究中国 56 个兄弟民族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在世界秩序调整和重构大局中的可能作为。就此而言,本文是笔者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的一个努力和尝试。

从本文的个案研究中可以认识到,民族主体在历史层面的物质诉求,促进一种共生互补型的民族关系结构的建立;当民族主体从历史的生存场景转换至共生的社会情境,主体的文化价值及族际共享共生这双重诉求贯穿于交往的全部过程;在认知、情感及伦理道德的交流过程中,民族之间因内在必然的要求而自发结成共时性与历时性、共享性与共轭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另外,也初步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过程不同于单个民族发展的过程,各民族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具体的现实诉求为前提,彼此互为主体,共同适应,共同发展,遵循着多元共生的运作逻辑,并具有自我调适的机制。

- [7] 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甸县志[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 185.
- [8] 余庆远. 纳西见闻纪[M]//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十二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61.
- [9] 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驻昆明办事处. 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G]. 苏郎甲楚, 等, 译.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200.
- [10] 卢晖临, 李雪. 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1).

(责任编辑 程 莘)